

编者按 革命老区濮阳，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。挖掘濮阳红色文化资源，回顾这片热土上曾发生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，有利于激励我们不忘初心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建设。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，本报开设“红色濮阳”系列栏目，以飨读者，同时也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提供相关线索或赐稿。

“红色濮阳”系列之一：

单拐：“中原红都”里的红色往事

本报记者 袁冰洁/文 通讯员 赵云芳/图

清丰，是一块充满红色印记的土地。1927 年，清丰县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8 年 10 月，清丰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。1929 年 4 月，中共清丰县第一届委员会成立。在中共清丰县委的领导下，清丰人民为清丰解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徐向前、杨得志、黄克诚、宋任穷、程子华、黄敬、王宏坤、杨勇、苏振华、曹里怀等多位革命前辈，都曾在清丰留下足印。单拐革命旧址、中共直南特委旧址、冀鲁豫行署旧址等革命旧址，以及革命故居、烈士墓、烈士陵园、烈士纪念碑等，至今仍在默默诉说着这块红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。

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濮阳，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，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，是其中一处代表。

单拐村是国家住建部第一批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，也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。这里诞生了我军兵工史上第一门大炮，曾是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政治、军事指挥中心，被称为“中原红都”。

单姓人曾经居住的村落

想去单拐村并不难：从濮阳市区乘坐城际公交到清丰县，下车转乘直达单拐村的旅游巴士，前后仅需一个小时。

与普通的中原村庄不同，单拐村的房子多为青砖灰瓦，小垂花门式的门楼极具特色，素淡清雅的色彩，精美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随处可见，给人古色古香的感觉。村民介绍，这些青砖灰瓦的古典建筑，多半建于清朝末期。村庄房屋以胡同的形式布局，共有 10 多条胡同。

2014 年出版的《清丰县志》记载：“据传，明洪武年间，有单姓人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，以姓氏取名单拐村。”有意思的是，虽然村庄以单姓姓氏得名，但目前单拐村村民大部分都姓陈。原来，260 多年前，单姓家族在村里雇佣陈姓农户做长工，随后单姓衰落，陈姓崛起，陈家慢慢成了单拐村的第一大户。

目前的单拐村，是濮阳市一处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。除了保存相对完好的传统建筑群外，景区主要有三大看点，分别为冀鲁豫边区抗战史实展馆、冀鲁豫军区纪念馆和名人故居。其中，冀鲁豫边区抗战史实展馆为新建不久，冀鲁豫军区纪念馆和名人故居则基本为当年原貌。

冀鲁豫边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

单拐村是如何与红色革命结缘的？这个小小村庄，缘何被称为“中原红都”……漫步于单拐村，这些问题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。

单拐与红色革命结缘，与当时的革命大环境有关。《清丰县志》记载，1944 年 8 月底，冀鲁豫边区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，清丰县全境获得解放。冀鲁豫军区为进一步扩大战果，解放南乐县城、濮阳县城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，打通冀南与太行根据地的联系，决定将指挥部前移。1944 年 9 月，中共冀鲁豫分局、冀鲁豫军区，自山东省观城县红庙村迁驻清丰县单拐村，司政后勤机关、报社、电台、医院等陆续入驻。

红色革命为何会选择单拐村？《清丰县志》分析认为，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 15 公里处的濮龙河东岸，不靠公路，比较偏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仅有村民 400 人，但地主多，好房子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单拐村及周边一代是冀鲁豫边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这里又是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。



冀鲁豫军区纪念馆。



抗战史实展馆内一角。

当然，中共冀鲁豫分局、冀鲁豫军区之所以迁到单拐村，也与陈笃之父子有关。陈笃之是单拐村的开明绅士，早年在外交商，曾做过国民政府参议员，花甲之年返乡，经营 70 亩良田。陈笃之乐善好施，待人宽厚，深受乡邻敬仰。抗战时期，他曾与晁哲甫一起成立清丰县抗日自治委员会，并被推举为会长，接着又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。陈笃之思想开明，其儿子陈平、女儿陈友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。单拐村的有关情况，就是陈平向分局和军区领导介绍并推荐的。中共冀鲁豫分局、冀鲁豫军区迁到单拐村后，陈笃之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，让给部队住，把自己的酿酒作坊无偿捐献给军区。他还说服族人，腾出家族祠堂作为兵工厂驻地，动员族人和村民腾房、捐粮捐款。

中共冀鲁豫分局、冀鲁豫军区迁到单拐村后，宋任穷、黄敬、王宏坤、杨勇、曹里怀、朱光、张霖之、张玺等领导聚集到单拐村，领导边区人民对敌反攻作战和建设边区，使单拐村成为冀鲁豫边区的政治、军事指挥中心。

生产出我军史上第一门大炮

推开冀鲁豫军区纪念馆的门，绿树掩映间，是 1944 年冀鲁豫军区的兵工厂旧址，陈列厅内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旧式兵器。

在这里，记者看到这样的介绍：“……1945 年 9 月，冀鲁豫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《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厂生产的意见》，在单拐村成立军事工业部，先后建立 4 个兵工厂。其中，第一兵工厂设在单拐村，全厂职工在设备简陋、环境艰苦的条件下，自力更生，土法上马，百折不挠，于 1946 年初，制造生产了我军兵工史上第一门大炮——‘盖亮号’九二式七十毫米步兵炮。”

由此可以看出，我军兵工史上的第一门大炮，就是在单拐村生产的。当然，“盖亮号”大炮目前并不放在单拐，而是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。

导游介绍，1945 年 9 月，为适应战争形势对武器装备、后勤供应的迫切需要，冀鲁豫军区决定在清丰县单拐村成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、军事工业部。我军建立了兵工一、二、三、四厂和炸弹厂等 20 多个兵工厂。其中，兵工一厂设在单拐村，二厂、四厂、炸弹厂、皮革厂均在单拐村附近，单拐村又成为冀鲁豫边区军工生产的中心。

因为一度是冀鲁豫军区的政治、军事及军工生产中心，使得单拐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。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夫人王定国（红军战士），在参观单拐革命旧址后，题词写下了“红色单拐，中原红都”8 个大字。

邓小平在单拐

单拐村和邓小平有缘。

《清丰县志》介绍，邓小平曾到过清丰三次，第一次是在 1939 年，第二次是 1945 年，第三次是 1946 年。其中，第二次到清丰时，邓小平就住在单拐村。

1945 年 1 月 23 日，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，即时进入冀鲁豫这个有 2000 多万人口的最大敌后根据地，并从太行、太岳根据地抽调有经验的减租减息干部到冀鲁豫去。当时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和 129 师政委，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的邓小平得到指示后，立即抽调太行、太岳根据地干部，先行奔赴冀鲁豫，同时决定自己也来这里。

1945 年 3 月初，邓小平率领北方局机关干部，从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镇出发，经林县，在太行军区七分区的护送下，从淇县和汲县之间的塔岗口出山，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。当天夜里，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接应渡过卫河，次日进入冀鲁豫地区。邓小平到达濮阳地区后，先在单拐村南十几里远的李楼村住了近一个月，把带来的北方局机关干部派往老区濮县、滑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，接着听取宋任穷等人的汇报，并传达了中央保护中农、团结中农等指示。

4 月 27 日，邓小平等人离开李家楼，来到单拐村，住



单拐村的革命家故居。



沙格寨村支前旧址。

在村民陈学修家。陈家大门朝西，是一进三的大院。进了大门，是个坐北朝南的三合院，堂屋是楼房，由房东住着；东面有南北 2 个小院，邓小平住在北院北屋东 2 间。

邓小平刚到单拐，便有喜讯传来——军区部队攻克了日军重要据点南乐县城。邓小平闻讯喜笑颜开，他幽默地赞叹杨勇：“男人头上戴冠，不失为‘勇’，不失为‘勇’！”

邓小平经过调查研究之后，于 6 月 6 日在单拐村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工作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邓小平指出，要从实际出发，抓住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，充分发动群众，分不同地区、不同阶段和阶层，区别对待，将运动约束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内。会议之后，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，极大地巩固了根据地。邓小平随后又协同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南乐、东平、阳谷、鲁西南战役，歼敌万人，扩大了冀鲁豫边区。

6 月 10 日晚，邓小平接到毛主席电报：“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，你在‘七大’当选中委，望接电即赶回总部，待美机去太行时，就便乘机回延安开会。”接到毛主席电报后，邓小平抓紧时间向北方局、平原分局、行署和军区领导安排和交待工作。不久，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告别了单拐村，前往延安开会。

今天的单拐村，除了有邓小平故居、邓小平休息处、邓小平上马台外，村里的老人也乐于讲述邓小平的故事。他们介绍，邓小平在单拐村期间，经常骑马到周边村庄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了解情况。邓小平骑的是枣红马（有说是枣红骡子），出发时都是利用石马台上马，既方便又安全。石马台旁边还有一棵古国槐树，树冠荫及整个街道，是个很好的乘凉处。邓小平工作之余，时常坐在石马台上和贫雇农促膝谈心。

行走于单拐村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冀鲁豫边区军民，在山河破碎、国家危亡的生死关头，以不朽的抗战精神和气壮山河的英雄情怀，挺身而出，浴血奋战，用血肉之躯在广袤的豫北平原上屹立起一座座丰碑。回望烽火岁月，他们的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，好像依然在眼前闪现。这或许才是单拐精神的真正内涵所在，也是单拐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。

致 读 者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延续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，而且是我们立足现实、面向未来的文化瑰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，要坚定文化自信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。

一座濮阳城，半部文明史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濮阳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龙文化、上古文化、杂技文化、姓氏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地名文化、名人文化等，在濮阳交相辉映。一脉相承、内涵丰厚的濮阳文化，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底色，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底气和深厚的根基。

走得再远，也别忘了为什么出发。为进一步提升濮阳文化自信，让濮阳人在了解濮阳历史、文化中汲取奋力前行的动力，本报决定开设文化专版，暂定每周一期。欢迎广大从事濮阳历史、文化研究的专家、学者及爱好者，踊跃提出宝贵建议并向本版赐稿，让我们一起为濮阳历史、文化的传承和光大，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电话：18539309838。
邮箱：yuanbingjie2002@126.com。

相关链接

中共清丰县第一个党支部及县委成立

1927 年 4 月，中共大名特别支部成立，后接收大名第七师范学校（简称“大名七师”）教务主任晁哲甫（清丰县六塔乡人）加入党组织。不久，大名七师清丰籍学生李仰斌、李润东、张德光也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。1927 年 5 月，晁哲甫、李仰斌、李润东、张德光、乔子荆等，因闹兵灾回到清丰，成为清丰县第一批中共党员，并随即开展活动。

1928 年 10 月，王近瑞（又名王启祥、王铁铤）等人在清丰县民众教育馆成立中共清丰县第一个党支部，王近瑞为书记，王冠儒任组织委员，岳国南任宣传委员，乔子荆负责青年工作。党支部建立后，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结合清丰县实际情况，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。

1929 年 2 月，清丰县已有 20 多名共产党员、3 个基层党支部。同年 4 月，中共清丰县第一届委员会在城内民众教育馆成立，王近瑞任县委书记，王冠儒任组织部长，岳国南任宣传部长，乔子荆任共青团书记。中共清丰县委成立后，领导了 1929 年冬季的“反八毛”斗争、1930 年的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斗争、1930 年—1931 年的学生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、1931 年下半年的盐民斗争、1932 年 3 月的罢教增薪斗争等。

清丰县人民的重大贡献

一、巨大牺牲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成千上万的清丰军民牺牲了生命。2532 名将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其中，营、科级以上职务及三等功以上者 86 人，卫河县委书记马天胜、清丰县长刘法尧、八路军某部一团团长万连等有等，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还出现了“一门三烈士”“一门四烈士”之家。

二、踊跃参军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全县 12673 人先后参军。其中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 2900 人，解放战争时期近 1 万人。1946 年 9 月，为第一次参军高潮，1647 名翻身农民、青年教师、学生和职工踊跃参军，光荣入伍；1967 年 6 月，为第二次参军高潮，全县一次入伍 5126 人，并从中选拔出 500 名出类拔萃的青年，直接奔赴延安，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。当时，送子参军、送郎入伍的话话美谈，至今仍被广为传颂。其中，高堡乡孟国村村民刘新长动员自己的儿子、侄子及村邻 147 名青壮年参军，被群众誉为“扩军大王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曾 2 次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三、支前工作。清丰县作为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之中心区，支前工作十分繁重。解放战争开始后，清丰、卫河两县委书记、县长为中心，分别组建战勤指挥部，各区、各村成立相应组织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广大人民冒着炮火，抬担架、运粮食，慰劳伤病员。至 1949 年 2 月，仅清丰县累计出动担架 3580 副、民工 28640 人次、大小车辆 395 辆，支援粮食 1750 余万公斤、柴草 1550 余万公斤、现金 23 万元。此外，还有军鞋、毛巾、鸡蛋、糖等慰问品。

四、1948 年 10 月 28 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》。根据安排，清丰、卫河两县县委分别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，要求所有干部报名南下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清丰、卫河两县抽调南下干部 122 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，两县南下干部同冀鲁豫全体南下干部一起，身着草绿色军装，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，荷枪实弹，从山东省菏泽市晁八寨村一带，列队出发，徒步踏上南下征程。

（摘自《清丰县志》）